不浪漫的人

姚 霏

看到日历才发觉，这天是我和老陈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可惜的是，我们都忘了给对方准备礼物。于是，老陈提议共进晚餐来庆祝，我说应该找个景观好一点的餐厅，老陈说，那就去外滩或陆家嘴吧。但想想下班都要晚上6点多，赶过去太晚，第二天我们还要上班孩子要上学，又一致否定了这个方案。我们还是像平常一样，在离家不远的商场吃了点东西，带着娃散步。

有人说，浪漫，就是做一些和平常不一样的事，这个意义上说，我和老陈都不是浪漫的人。因为是同学，我们跳过了形式化的“求婚”环节，早早开始合计各种结婚事宜。那时，我刚留校工作，备课任务重，而他请不出年假，所以“蜜月”也被我们默契地省略了。老陈是不善表达的山东汉子，我是风风火火的上海女汉子。谈恋爱时，我就很少挽他手臂，他也很少为我提包。这种模式延续到了婚后。结婚十年，老陈给我买的花或礼物屈指可数，我给他买得最多的是四季衣物，大多还是打折的。2014年我们有了女儿。新手爸妈的生活焦点只有孩子。争执多了，忽视多了。那段时间，我们并排坐在床头，偶尔也会感慨爱情变了味，然后在心有戚戚中陷入沉默。

转折应该是在2015年我生病后。术后一年，我一直处在各种“恐癌”情绪里，三天两头跑医院，老陈大多默默陪伴照顾。有一次，因为一个新发现的肺部磨玻璃结节，我被相识的医生找去谈话。那天老陈有个推不掉的聚餐，就在席间给我打了电话询问情况。当我告诉他暂时不要紧时，老陈居然借着酒意哭了出来。隔天我问他为什么哭？这个孩子他爸露出了男孩儿般的羞怯说：“担心了一个晚上，真怕你再有什么事。”印象当中，自我生病后，从未刻意说过一句宽慰话的男人，以这种方式“酒后吐真言”。我的心一下子软了、释然了。不善言辞，并不代表没有爱。陪伴是最长情的表白。

这几年，尽管我们还是各提各包，但包里大多是女儿最爱的物件；尽管我们还是不习惯牵手，但我们都会各牵女儿的一只手。有人常说结婚后，爱情会变成亲情，言下之意，总有那么点惆怅。在我看来，爱情是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惊喜太多难免疲劳，令人动容的，反倒是刻在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时时处处。于是，关于结婚纪念日怎么过、有没有礼物，大可不必纠结了吧。

商场的晚餐时分，五岁的女儿比我们还兴奋。我忍不住逗她道：“爸爸妈妈的结婚纪念日，和你有什么关系呀？你那么开心？”她说：“当然有关系。你们结婚了，才有了我呀。”多机灵的开心果啊！你看，这不就是最好的礼物嘛。

尽管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和平常一样，一点也不浪漫，但也可以倒过来说：把日常过得轻松和谐温馨，普通的日子和纪念日就没什么两样。

托遗响于悲风

——怀念扬颂斯大师

刘 蔚

由于急性心力衰竭，12月1日，指挥大师马里斯·扬颂斯不幸去世，享年76岁。

其实，关于扬颂斯健康不佳，好多年来，时有传闻。比如，1996年，他在指挥普契尼的歌剧《艺术家的生涯》最后一幕时，心脏病突发，倒在了指挥台上。彼时他还在美国匹兹堡交响乐团工作，后来当地的外科专家在他的胸口植入了一个心脏起搏器；近年来，由于饱受心脏病困扰，他多次取消原定的音乐会。对于他的健康状况，人们有心理准备，但噩耗传来，世界乐坛依然一片哀痛。

在同辈的世界级指挥家中，扬颂斯的音乐造诣和艺术成就毫不亚于巴伦博伊姆、捷吉耶夫、夏伊、莱托等人，而且其才华出众又谦逊低调的为人深得与他合作过的世界各大交响乐团与乐迷们的敬佩和爱戴。维也纳爱乐乐团第二小提琴首席透露：“我们曾多次主动要求增加扬颂斯的排练，他能用一种让我们心悦诚服的方式点出我们乐队最需要的东西。”柏林爱乐乐团的理事长说得更彻底：“我不知道乐团里有哪位音乐家不欣赏扬颂斯的。”大师生前长期担任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直至生命的终点，该团首席小提琴巴拉科夫斯基代表全团前往圣彼得堡，参加了扬颂斯的葬礼。他动情地说道：“扬颂斯先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和我们不可思议的指挥，也是一位不可思议的人，他散发出的温暖和爱无处不在——在排练期间，在私人谈话中，尤其是在音乐会上——这是他的标志。”

上海乐迷非常幸运，曾经两次亲炙大师的艺术光芒，尤其是扬颂斯率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首度访沪演出美妙绝伦，轰动申城。其中的一场音乐会也是在12月1日，仿佛是冥冥中的天意，只不过这发生在14年前。

那年深秋，申城街头西风吹送，凉意袭人。然而，12月1日、2日连续两个晚上，由于扬颂斯和他的亲兵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光临，金碧辉煌的上海音乐厅温暖如春，成了沪上爱乐人的狂欢盛宴。我听的是1日的那场音乐会，开幕前，音乐厅大厅里人群熙来攘往，欢声笑语不断，卞祖善、曹丁、张国勇、马晓晖等音乐界名流的身影赫然出现，但更多的是普通的乐迷，相熟的一位朋友因为腿部骨折，是撑着双拐忍着疼痛来听这场音乐会的。在这场令人难忘的音乐会上，扬颂斯指挥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和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他那娴熟精准而又对比鲜明、大开大合的指挥激发乐队达到了极佳的状态，扎实凝重而又饱满温暖的德式音响让音乐时而如微风拂面，时而如火山爆发令人震撼，精彩纷呈，高潮迭起，让全场听众如痴如醉。“正餐”结束后加演的两道“小菜”——比才《阿莱城姑娘》中的《法兰多尔舞曲》和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中的《双人舞曲》，后者大师演来尤其拿手，曾在苏联接受了完整的音乐教育的他，让这首乐曲呈现出天鹅绒般柔滑明亮、波浪起伏、楚楚动人的光泽，再次让听众迷醉和疯狂，回味无穷。

指挥台上的扬颂斯激情四射，舞台下的他却堪称谦谦君子。作为俄罗斯指挥巨匠穆拉文斯基的得意弟子，在穆氏1988年去世后，圣彼得堡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们一致要求扬颂斯接掌乐团的帅印，但主管部门却将此重任交给了另一位指挥家铁米尔卡诺夫。1994年，扬颂斯携圣彼得堡爱乐访问日本，有记者问他如何处理好与乐团音乐总监铁米尔卡诺夫的关系时，他微笑着回答：他与铁米尔卡诺夫是好朋友，两人的合作非常愉快。而他此时的声望和成就已经超过了铁米尔卡诺夫。扬颂斯曾先后受教于俄罗斯与德奥指挥学派的两大泰斗穆拉文斯基和卡拉扬，被视为天之骄子，不过他在1979年选择了名不见经传的挪威奥斯陆爱乐乐团作为自己音乐生涯的起点，因此在上海演出前的媒体见面会上，有记者问他当年和莱托一样有到大乐团发展的机会，为什么却挑选了默默无闻的奥斯陆爱乐？扬颂斯的回答坦诚而又让人钦敬：“奥斯陆爱乐乐团选择我的时候，我很年轻。当时刚从苏联出来，我实际上无法选择。很高兴有机会与奥斯陆爱乐一起成长，合作了23年。”

“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前些天，我翻出了自己珍藏的一张大师指挥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的唱片，唱片说明书的封底上有他当年在上海媒体见面会上送给我的签名，我视之为珍迹。然而，我更愿意在这萧瑟的秋日里，一遍遍地聆听他指挥的“拉二”，在那忧伤悱恻的旋律中，寄托怀念和哀思。

神童命运如何？

王 涵

有人问：世界上有没有神童？

有，眼下就有一位，据近日英国媒体报道，一名比利时孩子9岁大学毕业，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大学毕业生。这个名叫西蒙斯的孩子，用18个月学完了6年的中学课程，8岁取得了中学文凭。他在荷兰埃因霍温上科技大学，只花了9个月完成了学业。他的导师舒尔特教授作出评价：“他可能比我们见过的最聪明的学生，还要聪明三倍。”但是，西蒙斯不是一个书呆子。他也会玩《堡垒之夜》等游戏，照顾一只9周大的小狗，在社交媒体上还有近4万名粉丝，形象也活泼可爱。

所谓神童，是指智力超常、才华出众、禀赋优异的一些儿童。他们和同龄儿童相比，有着惊人的高智商。他们才华是天赋的，是与生俱来的。康德说过，天才的心灵力量，就是想象力和知性的结合，天才通过想象力和知性的相互作用力表现出自身之内在的自然，从而创造出美的产物。

神童，古今中外，所在都有。中国古代也有许多神童。三国时，曹操最小的儿子曹冲，7岁想出用水称象办法；南北朝有个孩子叫元嘉，可以“一心六用”：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口诵经史，目数羊群，兼成四十字诗，足书五言一绝；唐代骆宾王七岁能诗，写就《咏鹅》名作。宋代方仲永，从未学过写诗，有一天，他突然向父亲要来笔墨纸砚，即兴作诗四句，写得非常出色。

那么，神童们长大后命运如何？在正常条件下，神童如果得到学校和家庭的悉心培养，他们大都可以成为有用的人才。据中国科大少年班的统计，在第一届少年班大学毕业生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时代精英。张亚勤毕业后任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14年任百度总裁；陈晓薇19岁大学毕业后到美国读书，主修分子生物学，1996年任中国中央电视台外语记者，现为九城总裁；庄小威现为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邵中现为耶鲁大学教授；骆利群现为斯坦福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

但是，也有些神童是少时了了、大未必佳。曹操最喜欢的儿子之一曹冲，因当时医疗条件不好，13岁不幸夭亡。上面提到的方仲永，他的父亲认为儿子可以借写诗本领来赚钱养家，整天带着他到有名的文人家去应酬，显摆自己，不送他去上学；结果，方仲永的智力一天天下降，等到十六七岁时，变成了一个智力普通的凡人。王安石写了一篇《伤仲永》一文告诫世人：“彼（仲永）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矣。”王安石提醒大家：仲永的天赋，比一般人要优秀得多；但最终成为一个平凡的人，是因为他后来“不受之人”。

外国也有“方仲永式”的人物。1998年，13岁的英国女孩苏菲娅凭借惊人的数学天赋，被牛津大学破格录取。但是，这个数学神童在父母的巨大压力下，3年后离家出走。在失踪期间，苏菲娅在给父母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16年来，我受够了你们对我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虐待。”她还在邮件中诅咒父母应该“下地狱”。最后，警方在英国南部的一个海滨小镇找到了苏菲娅，然而，她拒绝回家。现在，这名昔日的数学神童是一家公司的普通行政助理。

还有一名语言神童希迪斯，6个月学会了26个英文字母，一岁半能读报纸。希迪斯3岁开始学数学，4岁时精通法文，9岁被哈佛大学录取，并在哈佛大学数学协会作过关于四维空间的讲座。希迪斯精通多种语言，包括英语、希腊语、俄语、法语、德语、希伯来语、土耳其语、亚美尼亚语。当时纽约智商测试协会主任斯特林称，希迪斯的智商在250到300之间，他从来没见过智商如此之高的人。然而，在盛誉之下的希迪斯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玩世不恭，孤芳自赏，变得与社会格格不入，甚至一度精神失常。成年后，希迪斯放弃了学术研究，从事营销工作，做了一名“跑街先生”。1944年，落魄潦倒的希迪斯病死在一间出租屋里，年仅46岁。

因此，我们对于身边的神童，不要捧，不要压，不要溺爱，不要拔苗助长，而要给他们创造健康的学习和生存环境，辅以肥沃的爱的土壤，悉心培育，去除杂草，保护他们的超常智力，保护他们的业余兴趣爱好，使之成为杰出人才。

北洋书院风物兼题红叶

段 茵

雁阵步云时，
澄光渡木迟。
风催黄叶地，
雨问沃鱼池。
淡对萝三亩，
清欢竹两枝。
评章陶令后，
竟起百家诗。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过草原（中国画） 赵 奇

钱途囧事

伍佰下

曾经，每逢远途，钱包像小猪肚子一样鼓胀，塞进我的行囊。

并非因为有钱，是为有备无患。即使三五年前，钱币也是硬通货。出个远门，必带银行卡，一般两张，借记、贷记各一。就算透支额度足够，拍拍胸口，如果那只皮夹子瘪着，就像空腹出门，心里的不踏实，叽咕乱叫。

到苏浙皖，三日左右行程，一两千元现钞在身，是谓不慌。

行至云贵川黑吉辽，不怀揣三五千元压身，不敢启程。

苦了我的钱夹，厚厚一沓吞下，每如虎狼之咽后的饿汉，饱胀得直打恶心。只得靠一日日、一站站地“消化”，方得苗条下去。然而，皮夹子在几趟旅途之后回不去原样，坏得最快。

那时候各地大商户里，POS机风行。若论沿街土特产商店，刷卡则不一定好用。每逢此刻，钱包如战士一样，冲锋陷阵，很快瘦身。也经常有尴尬。五六年前，西安回民街上，一路小吃下去，破开百元钞票，再破五十元的。最后一项，便宜到几块钱的肉夹馍，递过去十元纸币，找回五六张一元。

经千手、过油腻，不少纸币色沉渍多。拿进来，赶快想花出去。偏偏我不善“理财”，小票越收越多，皮夹子存不下，散落在裤兜中，鼓鼓囊囊。有一回，出差某市，从美食街转悠出来，裤兜肿胀，便索性坐上当地公交，吹夜风，换了一路又一路，再折返，总算边望野眼，边散去“碎银”不少。欣慰之余，等回宾馆最后一路车来。忽发现剩余小票离这趟车的票价差了一块钱。车来了，由不得不上。无奈又破开一张五十元，在门口等投散币者。于是，又回收进一大堆一块纸币……得！

不知不觉，钱在途中，变得越来越“无用”起来。

去年在深圳，赶上文博会扫尾，为一幅国外油画动了心。起念买下，装进木箱快递回沪。折让后一万四，快递四百多。头一次在外地买这么大的“土特产”，第一反应是摸一摸本已很厚的皮夹——却不够付。“扫码！”“扫我！”画廊主人与快递小哥回答得豪气。嘀嘀几声，现金流水般从手机里腾挪到了深圳主会场。

回团队，只留了手机照片炫给同行者。买了个大家伙，还两手空空——这感觉奇怪，有点不可思议。进而有点怀疑，是不是不用某宝、某信来刷，而是一张张、一沓沓票子数出去，会多一点犹豫与长考？这桩艺术品交易，大概也不会那么爽快达成？

话说那时口干舌燥，路过榨汁摊。老奶奶面似风干福橘皮，咧着嘴，递来石榴汁。露天临时摊位，生意小，不容易，赶忙摸票子。却见她再咧一咧嘴，递过来一张正方形纸片，蓝底二维码赫然。“嘀”一声，收款人“X小妹”赫然在目。新时代的小妹，欧了。

近两年里，在武汉，在广州，在杭州，在成都，在合肥，在郑州，不尝试下新地铁列车，不算真领教过城市新风景。生凑零钱、生怕不找的焦虑渐渐消失了，须臾不离身的小“盒子”，到处操控着进出站闸机乖乖放行。许多次，带出去的千元百元，回到上海，依然安详地躺在钱包里。

钱包似乎成了纪念物，一直还在背包里。纸币成了老奶奶，身板硬朗着，提醒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交集。

她偶尔“起身”，在我到威海路吃只收现金的“弄堂小馄饨”时，在我遭遇便利店断网或信号不佳时。这时候，她不再是过时囧客。她曾经骄傲，现在笑容可掬，未来面目迷茫。她还会一直在吗？

十日谈

付款趣事

责编：杨晓晖

在马德里生活，是不可能像在国内一样只带一只手机出门的，不光要带钱，还得带零钱。

夜光杯